

# 中国民主促进会 历史研究



## 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酝酿和成立

###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受尽日本帝国主义8年侵略战争的苦难煎熬后，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得以休养生息。

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抗战胜利后的建国总方针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之后，即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并不准备实现人民的愿望。为了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积极准备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独裁、卖国三位一体，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既定方针，这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蒋介石国民党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人民革命力量，在抢夺抗日战争的胜

利果实。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同时 又打出“ 国家统一 ”、“ 和平建国 ” 的旗号，玩弄和谈阴谋，再三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教育广大群众，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 43 天的谈判与斗争，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表面上接受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平等和结束国民党“ 一党训政 ” 等原则，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 统一军令 ” 和“ 统一政令 ” 的借口之下，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因此，10 月 13 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下了和平的伪装，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出内战的密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各界群众分别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或举行反内战集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再起。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被蹂躏了 8 年之久的上海人民，更渴望和平、民主局面的出现。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到上海的“ 劫收 ”，“ 法币来了，伪币依旧通行，物价日日高涨。人民生活的苦痛……更加厉害 ”，这不仅给上海人民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政治上歧视和压迫上海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汉奸周佛海为“ 上海行动总队司令 ” 要他防止“ 市民滋肇事端 ”；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对于汉奸不仅不惩办，反而给了他们很荣耀的官衔。对于人民则当做敌人对待，国民党当局以“ 收复区复员工作尚未完成者，应视为军事戒严区域 ” 为借口，剥夺了上海人民的言论、新

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行径使上海“人民的愤慨到了极度”。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三位一体的政策，是使上海 400 万同胞和全中国人民重新陷于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也是使国家陷于分裂动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1945 年 9 月至 10 月间 唐弢、柯灵主办的《周报》和郑振铎主办的《民主》周刊先后创刊，它们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禁，代表了上海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周报》发刊词指出：“加强团结 实行民主 这是本刊的使命”<sup>①</sup>《民主》周刊发刊词更指出：“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没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组织；我们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希望：中国在以 14 年来无数国民的肉血争斗得来的最后胜利之后，能够尽快的进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 乃是我们所希求”<sup>②</sup>。这两个刊物以及稍后创刊的《文萃》、《文汇报》等，给上海人民提供了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阵地，形成了以《周报》和《民主》周刊为中心的一股进步民主力量。

上海各界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组成团体，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斗争。于是，各行各业的工人成立了工会，学生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联谊会”，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界、文化界也都成立了各种联谊会、联合会。这些团体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产生了。

《周报》发刊词，1945 年 9 月 5 日。

《民主》周刊发刊词，1945 年 10 月 13 日。

## （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原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其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政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马叙伦 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 字彝初、夷初，浙江省杭县（今余杭县）人。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故乡养正书塾，当时，清朝政府极端腐败，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地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马叙伦深感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临毕业前为同学鸣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开除出校，于是到上海帮助几家报纸撰文，从事新闻工作。此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各地革命活动的开展，给他以深刻影响。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并先后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等地任教。1911年夏，马叙伦到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随即回国，在浙江响应武昌起义。浙江都督府成立后，他被邀担任都督府秘书。以后又到上海办《大共和日报》，章太炎任社长，他任总编辑。

辛亥革命后，他认为清王朝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可以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了。1913年，马叙伦到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国文教员兼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15年冬，在袁世凯称帝“登极”以前，他毅然辞去北大和医专的职务，离北京回上海，并策动他的学生廖容起兵讨袁，以声援蔡锷率领的“护国军”。

1917年，马叙伦应蔡元培的邀请，再次任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中，为支援学生运动，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中

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五四运动以后 北京大中小学教职员发起 “索新” 运动，马叙伦担任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 在 1921 年 6 月 3 日率领北京上万名教职员、学生往总统府请愿游行的斗争中，遭到军警的毒打，头部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出院后，马叙伦回杭州养病，被浙江省教育厅聘请为浙江第一师范校长，1922 年，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即返北京，任教育部次长。

1923 年，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的酝酿，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在北京，国民党员逐渐公开活动，马叙伦被任命为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叙伦衷心拥护。1924 年冬，孙中山为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扶病北上到京。在孙中山病重那些天，马叙伦参加了轮流守护工作。马叙伦目睹孙中山逝世前后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后，愤然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重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卅运动中，他联合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1926 年 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马叙伦就写了辞职书，愤慨地谴责了段祺瑞，于是遭到段的通缉，被迫化装离开北京回杭州。这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是马叙伦的旧友，马叙伦动员夏超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反对军阀孙传芳，又遭到孙的通缉。

1927 年，北伐军占领浙江，浙江省政府成立，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 1928 年底，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长 他再次被任命为教育次长。他每天早到晚归“案无留牍”，仍受到多方刁难，不能有所作为。1929 年冬天，他辞职再去北京大学教书。1930 年，马叙伦因拒绝重新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在北京

大学，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等几位教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张抗日，并联络各校主张抗日的教授们，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叙伦被推为首席。

1936年秋冬，马叙伦两次到四川，劝说刘湘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应当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逼蒋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上海沦陷。马叙伦困居上海，贫病交加。为避免敌伪迫害，他改名为邹华孙（邹为其母姓，华孙为中华民族子孙之意），蓄起胡须，专事著述。写成30卷240余万字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巨著。他曾掩护过一些抗日工作人员，也曾断然拒绝他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收买。马叙伦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马叙伦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期望祖国成为一个自由、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并名副其实地为世界五强之一。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极力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叙伦这时虽然已年逾花甲，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争取的对象。他积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地下党负责同志同他进行谈话后，他毅然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他通过当时上海出版的进步报刊《周报》、《民主》、《文萃》等发表了大量文章，大声疾呼要求和平民主，严厉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发动和扩大内战的阴谋。马叙伦不仅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而且是《民主》周刊的编委之一。他同经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文教界人士发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原华联银行（现上海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决心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共同奋斗。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王绍鏊（1888年1月9日——1970年3月31日）字却尘，江苏省吴江县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名门世家，17岁时中了秀才，并于1908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当时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频繁活动，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尝试。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号角，随后各省纷纷独立。这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各省联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相号召。章邀王绍鏊担任联合会交际科主任干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绍鏊陪同章太炎到南京晋见孙中山。1月30日，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与章太炎等联合立宪派张謇、熊希龄以及旧官僚程德全等组织统一党，随后应章太炎之邀到达北京。王绍鏊到北京后，才逐渐了解到袁世凯为统一党提供大部分经费、从而使统一党俯首听命于袁的内幕。这事使王绍鏊十分震惊，终于在5月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后愤而离京南下，回江苏任省都督府外交代司长。

此时的王绍鏊，虽然对于组织政党感到有些失望，但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仍然是热衷的，他积极参加了1912年底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春，他踌躇满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再次来到北京。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他曾与宋教仁相约，组织“新进步党”以与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提携合作。3月，宋教仁的被暗杀使王绍鏊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阴险毒辣，11月，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撤销国会中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王绍鏊愤而南归。1915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积极参加了讨袁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段祺

瑞、冯国璋的谋划下，下令恢复国会时，王绍鏊对议会民主政治又心存幻想，于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但是在 1917 年 5 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中，国会解散，王绍鏊再次逃离北京。8 月，他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后，只身赴粤，出席了国会非常会议，拥护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参加了护法运动。

1923 年，北洋军阀曹锟演出贿选总统丑剧，王绍鏊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 20 多人，断然拒选，回江苏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际，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以迎接国民革命军。此事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遭到通缉。1927 年 1 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

在武汉，王绍鏊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的许多动人事迹，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的主力作用，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他阅读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这些革命理论，使他茅塞顿开。十几年国会议员的坎坷经历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处处碰壁的严酷事实，使他渴望进一步研究这些理论，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武汉，他还看见了邓演达。随后，通过张群的关系，到南昌会见了他曾一度慕名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两度长谈后，原来的敬慕之情一扫而光。事后王绍鏊对张群说：“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就立刻有较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并预言：“此人如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说罢拂袖而去，归返上海。

回到上海后，王绍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到横滨桥内山书店买了一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抱回家中，足不出户，闭门研读。马列主义对社会发展、社会革命的分析 and 总结吸引住了他。他对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的理论尤为折服。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

真理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之后为议会民主政治艰难斗争的经历，认识到“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此他认识到“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鏊在上海参加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救国协会”。1933年春，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扩大抗日同盟军队伍，冯玉祥亲笔写了30多封密信派王绍鏊到南方各省策动接应，王绍鏊受命匆匆南去，信尚未送完，抗日同盟军却已告失败。王绍鏊陷入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更深刻的思考。

1933年秋，回到上海的王绍鏊与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王绍鏊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由于他有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党组织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他曾到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进行抗日，也曾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王绍鏊到北方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施尽威逼利诱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王绍鏊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日战争胜利，王绍鏊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有胆有谋，沉着坚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

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绍鏊积极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以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还在抗战期间，他就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了与三部分人士的联系：一是街坊邻居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张纪元等人；二是潘子欣、曹鸿燾、冯少山、谢仁冰等人；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并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为民主共同奋斗的愿望。1945 年 9 月至 10 月间，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及作法，王绍鏊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中国共产党，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中于蒋介石之手，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各党各派平等合作，实行民主政治，方才水到渠成，统一则是必然结果。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赞同，他们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以付诸报端。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他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所吸引，急问出自谁的手笔，并表示急于相见。这样，马、王二人一见如故，马叙伦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二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于是，他们经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并由马、王二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会。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认为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

经过一个阶段的认真筹备以后，1945 年 12 月 30 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成立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26 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

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指出：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立永固之国基，本组织是为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发起的，故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会通过了 4 项决议：

第一，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大会**。

第二，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凡各界无党无派人士赞同本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本会之意志表示，概由会员大会决议，交理事会负责办理之”；“本会会员应缴纳入会费一千元，常会费每月二百元”。

第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

第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 11 人，常务理事 3 人，在理事会未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已生 3 人协助。

紧接着，1946 年 1 月 2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到会者 33 人，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已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张凤举、许广平 3 人为候补理事。通过了由王绍鏊起草的以“意见书”为基础经广泛征求意见修改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宣言》明确阐明了对国内外时局的看法：

第一，“谨防战争的遗烬死灰复燃”。自从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五个月的时间，已经冲淡了不少人们对于这场恶战的回忆，但是弥天烽火留下的硝烟气味，还在断壁残垣的废墟里到处弥漫着，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内战，要谨防战争的遗烬死灰复燃。

第二，“人民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需要”。全国的老百姓在经过八年对日苦战之后，已经普遍觉醒，“他们已知道如何争取自己的前途 决不愿再受过去的桎梏。”他们已把握自己的命运 决心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运”，完成统一自主强盛的现代化国家建设 走上民主的大道”相反的 如果“中国依然放弃时机 内部分裂 造成不断的战乱 外来的压迫”依旧使中国“停顿在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姿态”是他们坚决反对的。“这种人民一致的心理倾向 是不可抵御的巨浪，谁挡住它的路，谁便被它的浪花所卷没。对于这个中国民心的向背 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研究而尊重。”

第三，“任何国家切勿助长中国内战”。《宣言》要求“世界任何国家，切实尊重中国的民心。不要漠视新生中国人民的力量，而助长中国的内战。”诚然，在抗日战争中，无论美国或苏联，都在行动上给中国以善意的援助，并且收到了击破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效果。“我们深切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而将永远为此后对华政策的指导原理”。

第四，《宣言》强调指出“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在国内方面，人民都盼望尽快实现政治的民主与国家的统一。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民主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必须从民主的实践中 获得统一的理论根据”，只要中国能实现民主，则政治与军事自然也就统一了”。民国元来之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全国民心一致向往的结果，决非勉强可求。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

第五“内战的因素须用和平方法来消灭”。目前内战的威胁，已是事实的存在“，我们坚决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因为以战争方式解决国内政治纠纷的时期，早已过去。“刚从对外战争脱离的中国人民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也断不能再忍受内战的祸害。我们肯定内战的因素，总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消灭的”。

第六，“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实行民主的起码条件。”和平解决政治的中心课题，是言论开放，是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些自由，就没有民主。“世界上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建筑在真正民意之上，一定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人民的视听为视听，人民的要求为要求。”因为老百姓所体验的痛苦，只有老百姓自己知道。凡是老百姓需要什么，由老百姓自己来说，自己来做，自己来决定，一切内战的因素都可能由老百姓自己来消灭。

基于以上立场，《宣言》郑重申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政治主张：

- (1) 自主自动的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 (2) 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 (3) 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 (4) 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承担；
- (5) 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 (6) 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订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 (7) 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 (8) 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宣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它对国际国内形势立场观点的全面阐述，政治主张的公开提出，表明它是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促进民主运动发展为职志的政治团体。它的成立，使争取和平民主的队伍中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必定对中国民主运动尤其是上海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她的成立，使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队伍中，又增添了新的一员。

1946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鳌为常务理事，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听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任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建立健全了中央组织，为推动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

### （三）政治协商会议前后的斗争

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成立时，正是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夕。政治协商会议是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召开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一再拖延。直至12月下旬，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的胜利和以昆明“一二一”惨案为标志的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运动的高涨，美国感到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决定派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争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才被迫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促进会虽没有能派出代表参加，但是对此极为关注。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1945年12月下旬马叙伦就在《周报》发表了论文《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他认为蒋介石在12月20日重申他本年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五次全会演讲中所提示的要点，“是给政治协商会议门前埋了第一座暗礁”，其目的是叫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此止步，以阻碍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马叙伦对蒋介石的提示要点即“政府立场是

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是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驳。他说：“所谓政府立场，当然是国民政府的立场。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政府，不是国民党的政府”。但是，“国民党凭着训政的招牌，把国民政府‘久假而不归’，近十几年来‘弹冠相庆的一辈一辈‘旅进旅退’充满了政府机关酿成了举国同声厌恶的官僚政治”。现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单是‘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并不能算是撤销一党专政”。现在蒋介石国民党强调的所谓“还政于民”的手续。只不过是坚持其一党专政的“敷衍文章”。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武力推行的结果，是“从国民党专政的法律上产生的”，并不是由国民大会产生的。既然“国民党的政权不是从国民大会得来的，那只要有国民承认的机关，便可以交给政权，政治协商会议已为全国所渴望，即可证明他已为国民所承认；只要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适合全国民众的要求，……就可以从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一个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而负社会声望的确为社会所信服的人们所组织的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交还的政权”，以“从一党专政过渡到民主”。因此，国民党所坚持的“这些不三不四为民主国家所不应有的仪式”，其用意是表明国民党只能还政于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

紧接着，1946年1月上旬马叙伦又发表了文章《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表达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所寄予的愿望。他说：“举国所期望着由他而结束34年间不民主的中华民国，更由他产

参见马叙伦：《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新蜀报》第17期，1945年12月29日。